

“新军事变革”背景下的“战场”重塑

□傅逸尘

不得不说,近年来,真正描写当下纯粹的军营生活的作品实在太少了,少到几乎被悬置和遗忘的地步,对现实的担当几乎无人理睬。这样讲并不是说军旅文学在当代中国文学现实格局中已经式微,情况正好相反——21世纪初年的中国文学恰恰以军旅长篇小说为主潮,建构起了国家民族的“主流意识形态”,并对社会思潮与人们的精神理想施加了极其重要的影响。但回顾这一主潮时不难发现,构成军旅长篇小说的主体部分却是历史与传奇。

当代读者对历史与传奇的迷恋显然与理想的虚无和思想的贫乏有关,于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被人们轻易抛弃的革命理想与道德伦理重新成为一种思想资源与理想乌托邦。问题是,这一源自革命战争时期并延至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革命理想与道德伦理毕竟已经远离了人们的现实生活,它可以在某一瞬间抚慰人们空幻的心灵与浮躁的情感,却不能真正解决当下人们的思想困惑与精神虚无。这也是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的“新历史小说”及“红色经典”改编剧的历史宿命。

换句话说,文学终究还是要面对当下现实,还是要面对当下生活存在,面对人们的思想与精神的困境。无法要求作家们都要在自己的作品中给出挣脱这一困境的方式与方法,但作家一定要去触碰它,这才是文学存在的价值与意义,才是真正的文学之境。用文学滞后说来搪塞远离现实的现象,恰恰说明其并没有进入文学的本质,甚至是一种反文学。对书写当下现实的强调并不拘泥于生活的表层,而是关乎对时代精神的把握与表现,对人性深度的探索与掘进,对生命存在的丈量与关照。

当下军旅小说总体上落后于军旅现实

卢卡契曾说过:“一切伟大艺术的目标都是提供一幅有关现实的图画。”长久以来,当代军旅文学始终坚守并积极拓展现实主义的精神与品格,积极表现波澜壮阔的革命战争历史和如火如荼的军队建设实践。生活的复杂性决定了小说的复杂性,而表现这种复杂性,是逼近现实的重要一步。然而伴随着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大众消费文化的勃兴,快餐化、欲望化、世俗化、私语化写作泛滥,很多作家放弃了知识分子精英文化的立场,远离了生活的“现场”,军旅长篇小说创作越来越难以与现实生活“同频共振”。有的作品观念陈旧,缺乏时代精神,有的一味追求求异,脱离部队实际,还有一些天马行空的作品过分沉溺于对“现代化”武器装备和“高科技”战场态势的精雕细琢,而忽略了对生活本相的探寻、对人物心灵的描摹和对军人精神世界的关照,因而整体上失去了对现实生活的反映和认知意义。

军旅长篇小说创作之所以无法真切地表现军旅现实生活,甚至远远落后于军旅现实生活,一方面是因为军旅作家对日新月异军营生活的陌生,当下的部队现实生活变化实在是太大了。正像柳建伟所描述的那样:“在这十几年,我们军队的建军思想、指导方针,已经与时俱进地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甚至是变革,已从‘打得赢,不变质’,经过‘三个提供一个发挥’,发展到了今天的‘能打仗,打胜仗’;在这十几年,我们这

■看小说

鲍十《东北平原写生集》消逝的爱情和村庄

鲍十的小说《东北平原写生集——小说二题》(《红岩》2014年第4期)以散文般朴素纯净的文字追溯过往、审视当下,风格鲜明、意蕴悠长。

小说中,“滕家渡”讲述了1968年那个特殊年代发生的一个令人揪心的爱情故事。滕家渡屯位于“宽河”边,朱景昌和阙亚芹自幼青梅竹马,互生情愫。朱景昌的“家庭成分”不好,是“富农”,属“黑五类”子弟;阙亚芹则是生产大队“革委会主任”的女儿。这份原本纯洁美好的爱情就这样因两家的“阶级立场不同”受到了阻碍。阙亚芹的父亲得知女儿已怀孕,立刻打电话给公社保卫组,说朱景昌“强奸妇女”,让他们来抓人。朱景昌惊恐之下跳进宽河溺亡,阙亚芹闻讯后发疯,也跳了河,两人都只有18岁。作者意味深长地说:“瞧,转眼已过去了40多年。”——如今,爱情虽不会因为“家庭成分”夭折,可这般生死相许的爱情在哪儿?

“走马川”则将笔触伸向了当今:一个“明朝的时候就有了”的走马川屯,如今人去屋空,人们搬往镇里、县里、深圳、三亚甚至俄罗斯、加拿大,仅剩下的一个住户也即将搬走。“房屋会渐渐倾塌,会长满荒草……屯子不复存在”,惟有小东霞独自去邻村上学,在寒冷冬天的雪地上留下的“清晰的小脚印”,在读者的脑海里无法消散。小说中,诗人为“消失的村庄”写下了无奈而怅惘的诗句:“小女孩的足迹,似是一首挽歌/献给炊烟和屋檐/歌词里,有不灭的月亮和灶火……”

吴君《这世界》善因与恶果

吴君的作品善于发掘人性中隐秘的、甚至是邪恶的一面,而作家真正的胆略并非在性事、血腥方面的大胆,而在于对人性的深度开掘。短篇小说《这世界》(《南方文学》2014年第6期)以平静温和的笔调,叙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故事。

德远老人把失去双亲的侄子王泉从乡下接到城里,并把他一手养大。回乡后的王泉从泥瓦工做起,终于当上包工头,成了“老板”,令德远老人由衷自豪。他在千里之外的城里享受着退休生活,也坦然享受着“愚民”的美誉,“每次耳热心红,他都相信是家里人,围在一起念叨着他,当然是念他的好”。王泉知恩图报,打来电话请叔叔回去体验一下“有车有房”的荣华富贵。这是德远老人一直在等待着的事情,接到电话,他兴奋、憧憬,然而,“施恩者”和“报恩者”之间的故事,暗礁密布,发生过什么只有他们自己清楚。德远老人归乡“赴约”,先在醉酒后感觉自己像“被抛上了天,在天上看着所有人笑”,醒来却躺在一张破床上,衣服被水淋透,鞋子灌了小孩的尿——王泉要用这样的方式让他体会一下饥饿、寒冷、求人施舍的感觉,并彻底揭开了当年“因为我,你得了单位多少钱”的老底,还有“四处混吃混喝”的资本、众人的尊重和赞美……

在表面的“善事”、“好事”背后,究竟藏了多少不为人知的动机和利益?残忍的“报恩”方式,又有多少合情合理之处?善因结出恶果,我们只能感叹“这世界”人心不古,乱了,变了。

(刘凤阳)

支军队已经初步进入由传统的陆海空一体、陆军独大到陆海空天电五位一体协同发展的新时期;在这十几年,我们这支军队已经初步完成了由机械化时代到信息化时代的飞跃;在这十几年,我们这支军队官兵的成分,受教育的程度,接受新观念、新思想的能力和速度,已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甚至,连征兵的时间都从冬季改到了夏秋季,以至于陈怀国的小说《毛雪》中的第一句话——“当天空降下第一场毛雪的时候,我就当兵了”已经成为“50后”、“60后”军旅作家们遥远的怀想与记忆。

另外一方面,军旅作家对“军事科技理论”的陌生和对我军“高科技变革”与“现代化进程”的疏离,也使得深刻介入当下部队生活、真实塑造“新型高素质军人”形象成为一种“有难度的写作”。相较于战争历史题材,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21世纪初年军旅长篇小说的现实题材写作都更显薄弱。部分军旅长篇小说,即便从题材上看,虽然表现或涉及了部队现实生活,但却远未体现出军旅文学应有的“强健而充分”的现实主义精神和崇高、阳刚的文学气质与艺术品格;未能深入到军旅生活的深处、细部,未能切中时代精神的脉搏,未能跟上新军事变革前进的步伐。

高新技术在军事上的大量应用,使得战争形态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亦引发了军事思想、组织结构、军队编制、训练方式等方面的重大变革。可以说,新军事变革的新奇图景已经远远超越了作家们的文学想象,军旅文学落后于新军事变革实践是不争之事实。从内部看,随着社会转型的不断深入,军队也面临着改革和调整。个人主义对集体主义的影响,功利主义对理想主义的冲击对军营文化产生了诸多消极影响。从外部看,近年来,我国周边安全环境的日益恶化和战争威胁的逐步升级,亦为人民军队的改革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一切为了打仗”、“能打仗、打胜仗”成为全军上下高度一致的目标和追求。

面对复杂而严峻的现实,军旅长篇小说作为一种重型文体即使无法从战略和技术层面及时跟上新军事变革快速跃动的节奏,至少应该从价值立场和精神取向层面发出自己强硬而积极的声音。毕竟,军人的思维与普通人有看本质的不同,军人血液里流淌的首先是“英雄主义”和“尚武精神”。从某种意义上说,军人是为战争而生的,没有了战争的支撑,军人身上所负载的诸如崇高、英雄、伟大等象征性的精神存在便无所附丽。在当下的军旅长篇小说创作中,传统的“英雄主义写作”被注入了新的时代主题,发生了本质性的新变,对“战场”的想象性、模拟性重塑,既凸显了英雄传统和崇高精神的继承与弘扬,更使得“战争伦理”在和乎状态下的新型高素质军人身上焕发出了时代的新意。围绕着对“战争伦理”的重建与阐释,21世纪初年军旅长篇小说的现实题材创作寻找了新的资源与视角,对军旅现实生活的反映力度也得以加强。

虚拟的“战场”与和平年代的“战争焦虑”

统而观之,当下军旅长篇小说对“战场”的重塑主要包含着以下两个向度:一是在和平环境下建构对抗性的“战场”形

■短 评

永不远去的声音——评陈灿的抒情诗

上世纪80年代,陈灿以他裹挟着浓烈硝烟味的战地军旅诗步入诗坛。他的作品,无论是早期在猫耳洞里创作的诗稿,还是近期对现实生活的观照与思考,都显示了一种战士般激荡的青春与澎湃的诗情,体现了一个战士诗人不屈的精神品格。如同诗集《抚摸远去的声音》的名称一样,陈灿在诗歌中记录的军号声、枪炮声、手术台上的电钻声以及母亲看见重伤儿子的哽咽声已随着那场逝去的战争渐渐远去去了。但是,那些声音坚硬的内核却仍如雷鸣般冲击轰响着,强烈地震撼着我们的情感和灵魂。这声音是历史的真实记录,是年轻爱国者情感的真实记录,是共和国战士音的真实记录。

一个正在为美好梦想奋斗的国家,需要的正是这样有血性的声音。陈灿的诗歌是来自中国军人的血性呐喊,体现了共和国之子的忠诚和勇敢。陈灿说:“按响枪的音键/让激情用一串闪光的辞藻/响亮起——高亢与豪迈”。

在那场远去的战争里,陈灿与他的战友们用生命谱写出青春的壮歌,他用诗句描绘出这样悲壮的画面:“你依然用双臂作桨/挪

《桃花红杏花白》是阎雪君的“乡村三部曲之一”。小说中对生活感到绝望的城市教师邵瑞到桃花峪支教起笔,通过对宋小蝶、燕百合两位悲剧女性生命轨迹的追寻,反映了社会转型时期乡村的变革与动荡。在灵与肉的交织中揭示了大变革背景下的美丽与丑陋、人性与兽性、失落与救赎。

阎雪君笔下的桃花峪弥漫着田园牧歌式的乡间小调与诗情画意,也充斥着延续千年的民间巫术和神鬼迷信。在这片远离喧嚣的土山土,粗犷的阳刚之气与纤细阴柔之美同在,化外之境的淳朴人性和民智未开的旧风陋俗相互衍生。

为了生存与发展,桃花峪的视野逐渐超出了乡土。两位女主人公放逐了土地,走上各自不同的经商之路,和宋小蝶的小媳妇当馆以及燕百合的课堂开张遥相对应的传统乡村社会模式根基的动摇,如同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所说的那样,农民一旦离开土地,那些因为土地而连接起来的聚落的温情也会随之消失殆尽。

尽管小说关注的视角始终在乡土,但是不可否认,这种乡土更多的是一种商业化的乡土。它虽然具备一切乡土文化的外在元素,但是其内涵和实质却带着城镇化的影子。但它又和真正的城市格格不入,

式,通过演习、突发性军事行动或对过往战争的回忆来“虚拟”战场环境,“设计”战争行动,书写新型高素质军人的英雄情怀和使命担当。如苗长水的《超越攻击》、徐贵祥的《特务连》、刘猛的《狼牙》《利刃》、冯骥的《火蓝刀锋》《我雷了》、刘克中的《蓝狐突击》等作品。《蓝狐突击》描写的是“80后”、“90后”的官兵,他们用青春的热情让和平年代的军营精彩纷呈。他们有的敏感、孤僻甚至叛逆、激进,但他们从来没有忘记自己肩負的使命,从来没有停止对战争的警惕和准备。他们在痛苦中挣扎、在情感中徘徊,在连续不断的战斗中体验战争、感受战争、触摸战争、理解战争,为的是当有一天战争来临,他们能够主宰瞬息万变的战场。

刘猛的《狼牙》突出塑造了刘晓飞、林锐、张雷、方子君、何小雨、刘芳芳等“70后”新型军人群像,与以往背负着国仇家恨而从军的革命军人不同,他们自愿放弃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和充裕的物质享受,凭借着对父辈军人血统的继承和理想信念的坚守而选择了艰险多舛的从军之旅。小说以改革开放和中国军队的现代化转型为背景,以新一代年轻军人的成长历程和心灵轨迹为主线,在社会与军营价值观念的碰撞中,突显了诸如牺牲、奉献、勇猛、坚毅、顽强等军人品格。《狼牙》中的所有主人公都是天生的战士,其存在的最大意义就在于战场。战争结束了,但战士还存在,此种悲剧性矛盾构成了极具煽动性和感染力的戏剧冲突。

《狼牙》对战场的“虚拟”,既不同于柳建伟《突出重围》中的“演习模式”,也不同于其他网络“铁血小说”对未来战争场面的逼真呈现,而是借助于突发性军事行动,将和平与战争状态对接,让主人公们在日常生活与战斗行动中跳入跳出,为平庸的现实生活增添了一抹激情的光泽。小说中的老中青三代军人,对于战争尽管有着不同的生命体验,但却葆有共同的军人理想,即“军人生而为战争”,和平亦是战争的延续,他们的生活状态被圈限,价值判断被纯化,理想追求染上了浓重的浪漫主义色彩。这种对“战争伦理”的追求与坚守,在同时期的市场经济浪潮中无疑是弱势而失语的,在以金钱与利益为核心的社会整体价值取向面前,他们的个人命运注定是孤独与悲壮的。因之,小说中对同志情、战友爱的极力渲染,对军人爱情跌宕起伏的戏剧性呈现,便不再单纯是吸引读者眼球的噱头,而是在小说的文本内部建构起了不同家庭出身、不同知识背景、不同现实处境中的军人们对“战争伦理”的集体认同。

二是围绕战争准备和部队建设,抒发和平年代军人的“战争焦虑”,表现新型高素质军人“能打仗、打胜仗”的坚强决心和理想信念。如王玉彬、王苏红的《惊蛰》《黑鹰基地》、徐贵祥的《明天战争》、周大新的《预警》等作品。在21世纪初年军旅长篇小说中可以看到,战争焦虑和战争渴望已经上升到国家、民族和军队集体的高度,成为一种普遍且有代表性的军人职业情绪。这种转变,我想除了作家本体创作观念的因素,最重要的原因来自于文学以外。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提高,面临的挑战和威胁也日益复杂和迫切,中国军队和军人的战争意识以及价值观念亟待加强和调整。战争焦虑和战争渴望之所以被提升至主题层面进行表达,正是基于“现实生活中

■主持人的话

军旅和军旅生活在当代的意识形态建构中,成为一种有些神秘的存在。如果没有军旅文学,也许我们就很难了解这一特殊社会存在的生存现实和精神面向。在这种意义上,军旅文学以及相关的艺术形式似乎天然地被赋予了书写现实的重任。只不过,特殊性总是受制于一般性,军旅文学的现实书写一样困境重重。傅逸尘的文章对此进行了独到的观察和分析。

——特约主持人 杨庆祥

容”复杂而深刻的变化。《明天战争》中以岑立浩为代表的一代军人在时代大潮的反复冲击下矢志不改,对部队现实满怀忧患之情,时刻站在部队改革和发展的前沿等待“明天战争”的召唤。《惊蛰》围绕着空军高科技变革进程中,新旧两种训练体制和思想的激烈交锋,以及战争观念和意识的艰难对立展开故事。以萧广隶、季浩苏为代表的新一代高层军官身上凝聚着强烈的紧迫感 and 使命感,他们对军队现实状况的担忧和焦虑,以及在“明天战争”中大显身手的豪情和勇气强烈地感染和震撼了读者。刘健的《战士》叙写的是一群个性叛逆的青年学生参军来到边疆,他们渴望以青春热血在战争中燃烧激情、建功立业;然而,军旅生涯的短暂与在国界线上日复一日的守望,使得他们承受着巨大的心灵煎熬。他们对战争的焦虑和渴望更多的是存在于心灵世界的躁动不安和脑海深处的激情想象。

21世纪初年军旅长篇小说中的“新型高素质军人”们在时代大潮的反复冲击下矢志不改,时刻站在部队改革和发展的前沿等待“明天战争”的召唤。“战争焦虑”与“战争渴望”既是小说情节的内在推进力量,同时又构成了作品的主题和意义内核。这一主题所表现的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精神不仅切中了当前新军事变革的现实脉搏,强化了军旅长篇小说直面“明天战争”的硬度和质感,同时也在广大官兵和普通读者中间产生了凝聚人心的作用和不可估量的精神动力。

守望军旅生活的“现场”

抵近新军事变革大潮下激情燃烧的军旅生活“现场”,不仅需要作家们具有广博开阔的文学视野,更需要具象细腻的写实能力。军旅作家们需要持续跟踪并深刻认识新军事变革对军旅现实生活的影响,将创作的笔触伸展到整个民族、国家转型巨变的时代脉搏上,敢于挑战并直面现实题材这一“有难度的写作”。

守望军旅生活“现场”可以说是军旅长篇小说作家正在追求的文学理想与写作姿态,而“有难度的写作”对军旅长篇小说的文体品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考验着军旅作家的文学立场与写作伦理。21世纪初年军旅长篇小说不仅要及时地反映现实生活,更要积极地介入现实生活;不仅要塑造出和平年代的新型高素质军人形象,更要彰显出有立尺“敢打必胜”的军人本色和壮志豪情。

“文学如何表达现实”讨论之十二

长/匆匆而过的脚步来不及停下/向你投去关注的目光”。

尽管陈灿理解和原谅人们这种遗忘和漠视,但他自己却永远不会遗忘。因为他深知:“忘记就意味着背叛”。多少年来,无论环境与身份如何转换,陈灿一直没有被世俗纷扰打乱自己前行的步伐,始终以一个战士的姿态,坚守在灵魂的高地上。

从战火中走出来的诗人情感更加丰富,阅世更加深刻。在《重温红色经典》组诗中,陈灿说:“我就是要在这一块搬动一张椅子/也会流出血来的地方/挪动江山/给我一个支点/地球就是我手中的一只杯子/让我们共同举杯把生活的/酸辣苦辣一干而尽让甜美的/琼浆把大地灌透”。

这就是一个战士的声音,同时也应该是一个民族的声音,有了这样充满自信和力量的声音,千难万苦也难以阻挡生命的青春、祖国的青春。

陈灿又用他的诗歌呼唤着青春中国,要“让甜美的琼浆把大地灌透”,他说:“只有不断从历史的废墟中汲取钙质/才能挺直现实的脊梁”,这正是陈灿诗歌给我们的启示。

传式”的悲剧因素,而且在庸常的世俗生活中总是遭遇各种意外的灾难,每一次试图改变现状的努力都以失败收场。

然而,燕百合虽然屡遭挫折,却从来没有放弃过对生活的希望,“贫困的生活非但没有减退她爱做梦的喜好,反而是贫穷,她越爱做梦,生活中缺少的往往在梦里会得到”。用林语堂的话来说,她是一个睁着一只眼睛做梦的人,是一个用爱及温和的嘲讽来观察人生的人,是一个把她的玩世主义和慈和的宽容心混合起来的人。

在生活的磨砺面前,燕百合始终保持着一个人的自尊、道德、底线和坚守,像一朵开在山野中的野百合,不卑不亢,不急不躁,怀揣梦想,坚守希望。

在作者的笔下,燕百合是一个殉道者,同时又是一个救赎者。如同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殉难的同时,也宽恕了人类诸世的罪恶。生活的挫折带给她的打击让她更加茁壮地成长,她不仅救赎了自己,也救赎了对世界感到绝望的邵瑞,挽回了他将死的肉体与灵魂。

在燕百合这个人物身上,寄予了作者对社会冷静而严肃的观察以及用以救赎世人的济世理想。小说因此闪烁着悲剧之光,照耀着这个不甘寂寞的世界。

□耿建华

□耿建华

□耿建华

□耿建华

□耿建华

□耿建华

□耿建华

□耿建华

□耿建华

□耿建华

□耿建华

□耿建华

□耿建华

□耿建华

□耿建华

□耿建华

□耿建华

□耿建华

□耿建华

□耿建华

□耿建华

□耿建华

□耿建华

□耿建华

□耿建华

□耿建华

□耿建华

□耿建华

□耿建华

□耿建华

□耿建华

□耿建华